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教育视野

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

□ 王辉耀

国际人才竞争空前激烈

当下，国际人才的竞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际人才的流动越来越频繁，人才竞争空前激烈。并且现在的人才市场对于人才已是全球定价。国际上很多公司都在“虎视眈眈”，不仅是对于那些高层次的人才，对于青年人才他们同样求贤若渴，包括海外学生、实习生。

面对海外市场，中国已经流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主要是一些出国后便不再回来的人才。根据2013年美国的一则报道，大约有87%在美国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选择留在美国。这其中多数毕业超过五年而不回国，之后回国的几率则进一步降低。此外，仅在美国，每年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的数量已经从数十人增加到了数千人。去年，美国共批准了约10000个投资移民签证，其中有大约8500个来自于中国，这也反映出中国人才外流的严峻现状。

发达国家国际人口（即并不在本国出生的人口）的比例占到10%，这些人主要由留学生以及海外优秀人才、技术移民组成。据统计，目前世界居住在海外的国际总人口约为3%，且这个数据每年以3%的比例递增。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比例则是最低的，在中国的国际人口数量不到100万。

中国企业目前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并且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开疆拓土。而中国现在也正在进行许多重大项目，如“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有这些都需要充足的人才储备。

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

目前，能管理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中国企业的高级人才大概有5000人，而中国对人才的吸引力和保留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中国企业对于海外留学人员的需求与实际招聘成果也存在着较大的缺口。当前中国对于引进的人才的重点还放在具有美国或者一些其他西方国家背景的人才上，而其他的人才可能会因此觉得被低估了。我们有着很多好的规划，但在具体实施层面却有点难以推行。

中国应更多地参与培养世界人才，通过邀请更多的海外青年来中国学习，吸引发展中国家的高级管理人才，也欢迎更多的学者前来参观学习。他们都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企业和机构应该创造一个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的环境。比如说，在重庆的西南财经大学中，有一个雇佣国际化人才的学院，专注于引进海外归国人才和外国专家一起工作，这会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使得他们能获得丰富的成果。中国的公司可以借鉴这样的做法，以使得国际化的人才能够留下来并且享受在中国的工作。中国的电子企业联想在企业邮件中一律使用英文，这会使得公司的海外职员表现得更好，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国际猎头作用不容小觑

中国的国际化人才招聘体系仍处于早期阶段，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猎头的作用不容小觑。

猎头在人才引进和人才储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猎头属于高端人才服务业，在人才选拔方面已具有较为成熟的考察流程和选拔体系。当下，人才的招聘应该变得更加专业化和系统化。猎头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针对人才的一系列测试和全面分析。猎头带来的不仅是人才本身，更是与人才相关的整体管理的流程与系统。

中国政府当前正在逐步推进猎头服务。不久之后，在有着中国的硅谷之称的北京中关村地区将建立起猎头大厦，而在上海和珠海等地区也可能突破传统的人才招聘体系以适应新时代人才竞争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一旦相关规定放宽，跨国性的猎头公司在中国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2015年可能成为猎头发展的黄金年。此外，中国还需要加大海外使馆吸引人才的功能，可专门设立相关的人才处等。一些海外国家如新加坡、以色列等设有专门的海外猎头办事处以引进国际优秀人才，这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当前猎头在中国的发展虽有所起色却仍面临瓶颈。中国的央企仍通过任命，中国大多数公司并不知道如何招聘职员，而部分大学等事业单位则还停留在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朋友等社交渠道或者面向海外以及参加招聘会等方式寻找高级人才。接下来，国企的全球招聘应该继续，国资委等部门也可适当放开国际猎头进入。中国企业、机构以及政府等需要培养使用猎头的习惯，改变原有的固化的人才招聘模式，进一步强化人才意识，通过猎头系统地寻找相关行业的顶尖人才。

成大事者必思危在前

——追忆成思危先生

□ 张红力

成思危先生于耄耋之年仙逝，令国人扼腕痛惜。斯人已逝，但成思危先生以其横贯中西之博学、虚怀若谷之胸襟、一丝不苟之严谨、以身示教之高义、平易近人之亲切树立起了一座丰碑。

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原则

“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勤奋”是成思危先生的口头禅。先生非常喜欢管理大师德鲁克的名言，“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更重要”，至于什么事情是对，什么事情是不对的，先生的判断依据就是林则徐的一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于国有利就是对的，个人得失要摆在其次。

成思危先生说，“报国是治学和从政的目的，而治学又是从政的基础”，做事最怕不治学、有偏见，“偏见比无知更难扭转，因为你无知的话，你是零，如果你有偏见的话，你就是负的，要扭转你负的偏见比扭转零更难”。很多人习惯于将金融视作一种纯粹的技术，或将金融博弈视作阴谋，这显然都是偏见，还没做事之前就偏离了金融行为超越技术层面、金融市场尽是阳谋的事实。知识是消灭偏见的利器。先生提倡四维知识结构，即专业的深度、学科的广度、哲学的高度和哲学的远见，引导学生们保有上进心、责任感和求知欲，注重积累、谋定后动，准备好再去做对的事。

先生教导学生们，做事要讲原则，他自己就以身作则。先生对学生无比关爱，身为国家领导人时，即便大事缠身，还会对每个学生的学业定期进行单独辅导，但先生有个原则，从不给学生推荐工作，因为他不想他的光环破坏了学生求职过程的公平性。先生做事讲原则，不谋私利，强调一视同仁。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师弟和先生约了下午2点见面商量论文，但由于有一位高级官员同日拜访，先生的秘书就私自把2点的时间档安排给了这位官员，把师弟排在了后面，先生看到日程后很生气，硬是要求将日程调回了原样，讲原则讲到了细节。

先生教导学生们，做事要严谨勤勉。先生常有惊人之论，但论点背后的论据，却格外翔实、严谨。先生讲课和做论文，对数据都非常敏感，每每要求学生核查数据出处，反复验证计算结果，务求做到精确。先生经常会在课堂上指出经典教材中的疏漏，甚至连教材习题部分提供的参考答案，他都会亲自求解，也发现了不少错误。先生的勤奋，更是让晚辈们汗颜。70多岁高龄的时候，先生还给自己定下了“每天看一小时书、每月写一篇文章、每年出一本书”的高强度计划，而且基本都完成了。去世这一年，先生出版了《中国股市回顾与展望》，去世前一年，先生出版了《人民币国际化》中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先生还亲自参与了翻译校对工作。先生办公室里挂着自书的一句话，“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这恰是他严谨勤勉一生的精辟总结。

先生教学生们，做事要理论联系实际。先生晚年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开设了三门课，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莫顿的《金融学》和《中国特色经济学》。第三门课直接讨论现实问题，前两门课用的都是经典教材，但先生的教法是把中国实际同理论相结合。例如讲到汇率理论，先生会讲人民币的两类购买力问题，会讲人民币汇率如何是政治博弈工具，会讲人民币汇改的现在和未来，突出理论和现实的相互作用。先生做学术，更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求每项研究的成果都要有针对性、及时性和可行性。所提出的建议应当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合理、法律上允许、操作上可执行、进度上可实现、政治上能为有关各方面所接受的，以尽量减少实施过程中的阻力。

先生教导学生们，做事要情有独钟。先生博闻强记，研究领域十分开阔，工作量也十分繁重。但先生却说：“我对做学问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乐在其中、自得其乐、其乐无穷。”在工作中找乐子、找情趣是先生“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的窍门。先生年纪不小，却从未显得老态龙钟，对于所有时尚的电子产品，他都乐于尝试，很早之前就用ipad辅助教学，他总是强调，只有对这个世界始终都有好奇心，才能找到改变这个世界的学术钥匙。

毕生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

成思危先生不是完人，但先生的人格魅力令人打心底里尊敬和佩服。先生“心随朗月高，志与秋霜洁”，高远的志向、纯净的心境、谦和的性格、仁爱的基因、宽广的心胸，感染着每一个靠近先生的人。

先生教导学生们，爱国是为人之本。先生的座右铭是“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先生也曾说过，“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先生一生三次重大选择，都是为了国家而改变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的爱国，言行一致，毕生都在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献策献力。先生英语很好，在国际上发表过一系列以“中国和世界”为主题的演讲，赤诚之心溢于言表，精辟之言折服友邦，每每引爆现场，引发经久不绝的掌声。先生说：“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因此，加强国际合作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中国的将来，一定是进一步地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更进一步地加强国际合作。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国际社会一道建设成一个和谐的世界。”

先生教导学生们，敬人即是敬己。先生总是要求学生，“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对人要真诚，对事要公正。先生总是有一种谦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气场，很重要的原因是先生尊敬每一个人，无论身份、地位、见识有多大差距。先生的课上，学生们经常会有15分钟的个人观点陈述，无论讲的是对是错，先生总是会耐心听完，从不中途打断，哪怕中间有没说清楚的部分，先生也会在学生全部说完后才提出疑问。先生总结能力超强，有逻辑有观点，往往一句话就能概括学生们说的一篇论文，但即便如此，先生也从不贸然总结，总是在充分的讨论后再发表观点。先生写文章从来都是自己动手，从不因为自己是领导、是老师就随意占用他人成果，在《人民币国际化之路》的序言里，先生就特别强调，“书中凡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均用‘我们’，而我个人的观点则用‘笔者’来表述，以示区别”，严谨如斯，尽显高风亮节。

先生教导学生们，君子自强不息，“逆境不沉沦，顺境不懈怠”。事实上，这也是先生一生的缩影。在做工人时，先生一边烧锅炉一边学习了《锅炉学》和三门外语；在做国家领导人时，先生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曾经为了更好地工作和交流，两年时间就自学了西班牙语。“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是先生对学生们的要求，也是先生身体力行的人生信念。

随想录

用国学涵养中国精神

□ 陈　来

当代的国学热是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相伴随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已经或者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在从自在转到自觉，国学热正体现了这种自觉。自觉认识自己文化发生成长的历史，认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存在价值及其普遍意义，把个人融入历史文化长河中，从而建立起文化认同。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而言，文化自信促进文化自觉，增强民族生命力，振奋民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国学热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复兴初级阶段的文化标志。

同时，国学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本土传统资源的热烈渴求，当前，社会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问题日益突出起来，由此，促进文化转型构成当代文化的大背景。社会道德建立离不开传统文化，这是执政党和人民的共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人与人关系的新变化，心灵需求比以往更加突出，使得新一代把眼光转向传统智慧和中国文化宝库，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生活规范、德行价值、文化归属感会起到其他文化要素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看来，当前国学热对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对社会和谐的促进作用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积极的，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当然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根基，在其基础上如何建构起适应人民需要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系，发展政治文明、维持经济增长、健全法治生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同时我们也需要通过适当引导，来帮助民众在学国学中分辨传统文化糟粕，使传统文化资源更能够结合时代需求而发挥作用。

2011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开始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历史，一直到2013年以后系列重要讲话里面，谈到领导干部要学国学。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提高领导干部文化思想政治修养。2011年开始，他特别强调中国古人治国理政的智慧，后来他强调还要联系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高尚精神追求，这就把学历史扩大到学国学了。他后来又讲，领导干部学文化要注重提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解决三观的问题。后来他还讲到，通过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道路根源。中国道路怎么走出来？就是跟着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借这个历史走出来，所以有深厚历史根源和现实根基。最后他强调的就是中国精神。

文化视野

史 镜

唐朝宰相的权力

□ 王丹誉

《大唐语林》记载：有个深得唐玄宗欢心的“方伎供奉”，他的女婿王如洮参加科举。他就请求玄宗开恩帮着女婿及第（录取）。玄宗答应并命令礼部：本科考试须取王如洮及第。试后，负责科举的礼部侍郎将皇帝钦点王如洮进士的情况报告给宰相。宰相问：“他的文章能达到录取的标准吗？”侍郎如实回答：“介于及第与落第之间”。于是，宰相说：“那就不能让他及第。科举是国家取才大典，怎么能凭皇帝一句话，就把功名与人？”宰相否决之后告知皇帝，玄宗只好取消成命。得到皇帝钦点的王如洮自以为稳操胜券，在家中大宴宾客，却接到落第的消息。

这的确让人对这位宰相肃然起敬。在中国历史上，唐代宰相制度深受后人推崇。唐之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若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机务等名就是名副其实的宰相。唐宰相制度较之两汉有很大发展，较之南北朝更完善成熟。高祖之世，是唐宰相制度形成阶段，宰相风采已显端倪；太宗至天宝之初是完善阶段。那么，唐朝宰相都有什么样的权力？

废立太子和皇后须经宰相同意

废立太子、皇后，看似皇帝个人私事，但在唐朝都要征得宰相同意，方能获准。永徽五年（654年），高宗欲废皇后立武昭仪（就是日后的女皇武则天），就和武昭仪到宰相、太尉长孙无忌家“走门子”，又是欢饮，又是封赏他的三个儿子为大官，还送了十车金宝缯锦的重礼。高宗百般讽喻，长孙无忌就是不搭茬，高宗碰了个钉子扫兴而去。武昭仪又让她母亲杨氏到长孙府，多次请求，无忌始终不答应。礼部尚书许敬宗也数劝无忌，竟然遭到声色俱厉的批评。迂回之术失利，皇帝不得已，为了废立皇后的事只能和宰相短兵相接了。第二年——永徽六年（655年），高宗召开“宰相会议”旧事重提。褚遂良仍然坚持不能废黜皇后，以致皇帝恼羞成怒地散会。第二天高宗又继续此议题。褚遂良对皇帝说：“陛下一定要换皇后，请从名门望族选后，为什么非武氏不可！”并且当众揭了武氏“经事先帝”的老底，说罢放下笏板，叩头流血说：“把这官职还给你，放我回家种地。”高宗大怒。躲在帘幕中的武昭仪怒不可遏地大喊：“干嘛不扑杀这畜生！”长孙无忌对皇帝说：“遂良是太宗的顾命大臣，即使有罪也不可用刑！”在场的官员吓得不敢出声。可见，皇帝想让宰相支持他的不合理的动议根本不可能。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备受唐玄宗宠爱的惠妃向皇帝进谗言陷害太子。玄宗大怒，就告诉宰相要废掉太子。宰相张九龄引用历代废储引发动乱的教训，警告皇帝不能废储。玄宗无可奈何。惠妃无奈又悄悄派亲信游说张九龄，并暗示他帮助废黜太子，就可以永保相位。张九龄痛斥说客，并报告玄宗，皇帝为之色动。

这种斗争从迂回出击到短兵相接，无论其结果如何，足见唐朝宰相制度的严格。

皇帝诏令不经宰相即为非法

诏令是由中书省根据皇帝旨意起草，草拟的官员如果认为不妥，有权拒绝起草。诏令起草出来，要经过门下省核准，如果认为不妥，就可以退回中书省。只有通过审核，才可以送到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接到经门省下审核的诏令，如果发现不妥，也有权拒绝执行。皇帝旨意要以书面形式下发，看似皇帝金口玉言的书面化，其实并非那么简单。

皇帝任命官员必须经宰相批准

在唐朝，任命官员一直是经尚书省有关部门初拟，报中书、门下两省宰相审核，报由皇帝“进画”（批准），再经宰相下达到具体的工作部门。这个制度一直严格执行，直到唐中宗时却出现例外。他不经两省宰相径自封官，身为皇帝也自觉为难，不敢用装诏书的正规封袋，也不敢照常式封发，只能改用斜封，所书“敕”不敢用朱笔，改用墨笔，史称“斜封墨敕”；所封之官也被讥为“斜封官”。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先后揭发“斜封官”一千四百多人，闹得这位破坏制度的皇帝狼狈不堪。景云元年（710年），刚登基的睿宗皇帝批准了宰相姚崇、宋璟等关于全部撤消前朝“斜封官”的奏议，中宗时代的“斜封官”终被悉数罢黜，宰相制度得到进一步坚持。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春，户部长官职位出现空缺，正巧碰上京兆尹韦澳给皇帝奏事，皇帝觉得这个人合适，就想让韦澳接任户部长官。面对提升到户部长官这样的肥缺，韦澳却坚辞不受，让宣宗大为不快。后来，韦澳说明原因：“皇帝不和宰辅商议，私自想重用我，别人肯定会说我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得到提升的，那我怎么能替自己辩解啊！”可见，在唐朝宰相在任命官员过程中具有的重要作用是得到普遍认同和支持的。

皇帝继承帝位的合法性须得宰相认可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刚刚登基的武宗皇帝准备发布登基册牒，这种诏书上按惯例要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宰相）们联名签署才算合法有效。武宗继位颇具传奇色彩。开成五年（840年）文宗晏驾，太子年幼，大宦官另选择皇位继承人，本来要想迎立年长的安王。迎驾的宦官按照宫中定策“迎大者”，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把颖王立为“皇太弟”继承了皇位，这就是武宗。宰相们也因此对武宗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当朝宰相之一的谏议大夫裴夷直看着武宗皇帝的登基册牒就是不肯签名。虽然《资治通鉴》取《武宗实录》把这事巧妙地记载为“漏名”（忘记签名），但可以想象这么重要的公文作为当朝宰相怎么会“忘记”。对此，《新唐书·裴夷直传》是如此记录的：“视册牒不肯署”。武宗皇帝终无计可施，只好找别的借口把裴夷直贬为杭州刺史以解胸中不满。由此可见，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视宰相签署册牒的重要性的；同时宰相也十分珍视自己的署名权。因为，他们双方都知道，这关系到皇帝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据《资治通鉴》记载：“故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同署名。”可见这也是一项制度。

延续289年的大唐王朝，前期之所以能够开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中期“安史之乱”之后，之所以能够唐室光复再造；后期，虽然出现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但依然能够做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关键都是当朝的宰相制度。无论国力鼎盛，还是国势衰微，无论明君在上，还是昏主乱政，只要宰相的职权能够行使，就能维持国家政治的运行。就连岌岌可危的晚唐时的宰相郑畋都感慨万端地说：“国祚安危，在我辈三四人画度。”可见，唐朝宰相在整个王朝中的中枢作用。



刘方平诗一首　　张实惠/书